

目 录

学习鲁迅彻底批判“四条汉子”

……上海鲁迅纪念馆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写 (1)

评周扬反动的“全民文艺”论……辛文彤 (28)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蔚 青 (41)

——斥周扬、夏衍一伙鼓吹的“写真实”论等
反动文艺理论

评“文科教材”黑会……复旦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54)

——揭露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无产阶级就是“压抑”资产阶级……齐永跃 (66)

附录:

彻底清算“四条汉子”的反革命罪行

学 习 鲁 迅

彻底批判“四条汉子”

上海鲁迅纪念馆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写

《解放日报》编者按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他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所向无敌。特别是到了后期，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了革命的辩证法，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因此，政治眼光更加锐利，战斗文章越发有力。他不仅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战斗，而且还同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界的代表，他们混进革命队伍，配合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革命营垒内部，对鲁迅发动了“笔尖的围剿”，射

出了“从背后来的暗箭”。鲁迅愤然地举起了投枪，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无论“四条汉子”多么善于变幻，巧于钻营，终于逃脱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的眼睛。在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条汉子”终于被揪了出来，打翻在地，真是大快人心！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四条汉子”也并非死老虎。他们虽然落水了，然而仍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企图反攻。而且，他们的流毒甚广，倘不深入批判，就会借尸还魂。前几时跳出了一个桑伟川，为《上海的早晨》翻案，不就是这种反攻的尝试吗？“四条汉子”不是还在假别人之手，借反映革命现实为名，写反革命的剧本吗？在文科大学中，不就有人打着“五·七”教改队的旗帜，走着周扬办学的老路吗？更不能容忍的是，在批判“四条汉子”的枪声打响之后，在有的单位，“四条汉子”的手下干将

还骗取到重用；有的单位积极搞革命大批判的人还受到压制。批判和反批判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和继续。在这个短兵相接的时刻，我们重温当年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檄文，感到分外的亲切，受到巨大的鼓舞，获得极多的教益。

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和反动思想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学习鲁迅，发扬硬骨头精神，不怕压，不怕攻，为革命利益坚决斗争到底；学习鲁迅，彻底革命，将狗打落水中，又在水中痛打之！

这里选编了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部分语录，供大家在当前批判“四条汉子”的斗争中学习。注释，是我们学习中的点滴体会，仅供参考。

一、鲁迅敏锐地揭露出“四条汉子”的反革命本质

“四条汉子”的由来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

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鲁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六卷第四三七、四三二页

注：“一位名人”，指夏衍。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指夏衍，阳翰笙。“那些自称‘指导家’……的青年”，即周扬一伙。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的问题，就是鲁迅最早提出来的。

鲁迅具有高度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大胆地指出周扬等“四条汉子”“系敌人所派遣”的“内奸”。历史的事实，正证实了鲁迅的判断。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 “右翼”作家的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激烈的，“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

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九三〇年），《全集》第四卷 第一八二、一八七页。

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文献，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战斗檄文。在这个讲话里，鲁迅既批判了那些脱离实际的空谈家的主观主义作风，又批判了他们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指出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工农大众，而是为了小团体或个人。鲁迅还十分尖锐地提出警告，指出这种“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历史的发展不正是这样么？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九三二年），《全集》第四卷第三四五、三四六页。

注：这是鲁迅写给周扬的一封信，对周扬一伙提出了严正的批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是党八股的重要罪状之一。鲁迅此文，即对此而发。毛主席指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

党八股，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三股歪风。鲁迅与之奋战，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全集》第四卷第二三四页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

……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全集》第四卷第二三四、二
三六页

注：《上海文艺之一瞥》也是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文献。在这个讲话里，鲁迅从历史发展上剖析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并预示

了他们变化的必然趋势。“四条汉子”们开始就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激烈得可怕，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打成“封建余孽”、“法西斯主义者”；曾几何时，他们一筋斗却翻到了极右，于是又从右边向鲁迅狂吠不止。但是，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破坏党的政策，适应阶级敌人的需要，打击革命派。

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全集》第六卷第四三一页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全集》第六卷第四七四页

注：鲁迅得引为同志而自以为光荣的，是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里，鲁迅表示了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心情，也表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革

命政策的决心。正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与周扬之流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全集》第六卷第四三五頁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九三六年），《全集》第六卷第四七五頁

注：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鲁迅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而周扬之流的“国防文学”口号，则是根据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三十年代中期，王明从“左”跳到右，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向反动派投降。鲁迅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防文学”的实质，是要无产阶级

“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这也是生活”……》（一九三六年），《全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

注：《赛金花》是夏衍的大毒草，被周扬之流捧为“国防文学”的“杰作”。“最中心之主题”即周扬文章中的用语。但该剧却也正暴露了“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的实质。鲁迅在此，加以怒斥。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半夏小集》（一九三六年），《全集》第六卷第四八〇页

注：这是批判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的阶级投降主义，而阶级投降主义却正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先导。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以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未刊书信）

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鲁迅书简》（以下简称《书简》）第七一〇页

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

大計，甚至在集會上宣布我的罪狀。……中國究竟也不是他們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來已作二文反擊，他們是空壳，大約不久就要消聲匿迹的：這一流人，先前已經出了不少。

（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書簡》第九七二頁

注：“集團”，指“左聯”；“協會”，即“文藝家協會”。周揚之流背着魯迅，解散了“左聯”，這是他們執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反動組織措施，而且是直接受命于王明的。魯迅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提出了嚴正的抗議，尖銳地指出，這是左聯的“潰散”，是“停止”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且斷然拒絕參加周揚們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集團——“文藝家協會”。周揚之流對此怕得要命，恨得要死，於是乘魯迅重病，就“大布圍剿陣”。徐懋庸的信，即是其計劃行動之一。魯迅看透了他們的反動本質，《答徐懋庸并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二文，就是對周揚之流的有力回擊。

一支由叛徒、內奸、特務 組成的反革命別動隊

其實，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因為那時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所以有些人以為一經加入，就可以稱為前進，而又並無大危險的，系料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這還不算壞，有的竟至於反而賣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緊，只要質地好，而現在連這也做不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書簡》第七八〇頁

凡有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所謂“文學家”，

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书简》第七七一页

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

《〈伪自由书〉后记》（一九三三年），《全集》第五卷第一五一页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九三一年），《全集》第四卷第二二五页

注：鲁迅这些话，彻底地透视出“四条汉子”们的投机家的丑恶灵魂。这种人投机革命，往往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企图以此攫取私利，他们肆意破坏党的政策，已属为害非浅；压迫一至，立即投降变节，出卖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特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严防投机家混入革命队伍。

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惟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会激烈起来，判我辈之印古董以重罪也。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全集》第十卷第一二六页

田、华两公之自由，该是确的。电影杂志上，已有他们对于郑正秋的挽联等（铜板真迹），但我希望他们此后少说话，不要象杨村人。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书简》第九四六页

丁君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书简》第三三三页

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书简》第七六九页

田君被捕后又释放了，现在正大大地为南京政府（当然，同时也为了艺术）而活动。这当然也是他的自由，不过据说在田君身上随时都围绕着正义与真理，这却又有些想不通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鲁迅书简补遗》（以下简称《书简补遗》）第二九七页（据未删节信重译）

注：田，田汉；华，华汉即阳翰笙。他们被捕之后，投降叛变，从狗洞里爬了出来，一变其极“左”的嘴脸，而为国民党反动派歌功颂德。鲁迅对他们痛加指斥，警告他们“此后少说话”；但他们在王明、刘少奇的包庇下，反而青云直上，发号施令。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这里也腐烂得真可以，依然是血的买卖，现在是常常有人不见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廿一日），《书简》第四〇九页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九三四年），《全集》第六卷第一二〇页

现在无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书简》第九四七页

注：元帅，指周扬；“忏悔者”们，指田汉、阳翰笙等叛徒。周扬恬不知耻地吹嘘为“可爱的队伍”的，就是这样一支由叛徒、内奸、特务所组成的反革命别动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半夏小集》（一九三六年），《全集》第六卷第四八〇页

那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不过是 剥削阶级的“兄弟阋于墙”的文学

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九二九年），《全集》第四卷第一〇七页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鬩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全集》第四卷第二三八页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损益。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一九三一年），《全集》第四卷第二九三页

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九三〇年），《全集》第四卷第一八五页

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

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九三〇年），《全集》第四卷第一八四页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鞀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革命文学》（一九二七年），《全集》第三卷第四〇七页

注：夏衍、田汉、阳翰笙之流无耻地以革命文艺的“祖师爷”自居，而他们手下的喽罗也肉麻地加以吹捧，说什么他们的作品“是党在电影阵地上揭起的第一面红旗”，等等。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其实，鲁迅早已揭穿了他们的假面，指出这种“貌似革命”的作品，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客厅里的“别致”的装饰品，与无产阶级文艺毫无共通之处。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

《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全集》第四卷第二三七页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